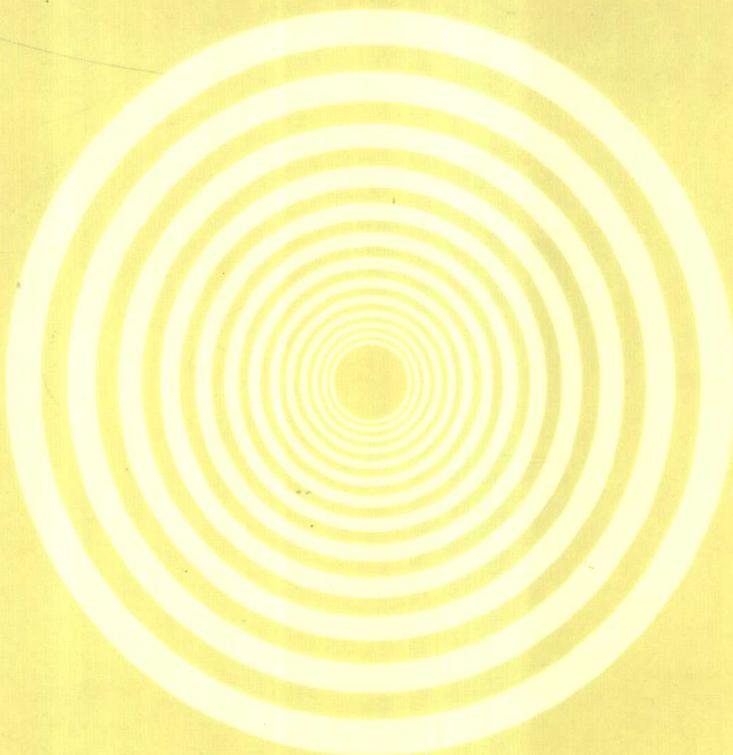


主编 李峰 副主编 刘明

当代中国 对外关系概论

DANGDAI ZHONGGUO DUIWAI GUANXI GAILUN

1949-1999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

(1949—1999)

主 编 李 峰

副主编 刘 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李峰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

ISBN 7-5004-4623-3

I. 当… II. 李…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1949~1999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613 号

责任编辑 周兴泉

责任校对 杨翠英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875 插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假权必究

目 录

序 章 新中国成立前中外关系的历史线索	(1)
第一节 中国古代外交的辉煌与局限	(2)
第二节 晚清外交的屈辱与困境	(7)
第三节 中华民国外交的曲折演进	(11)
一 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	(12)
二 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	(14)
第一章 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及成就	(26)
第一节 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历史阶段与特点	(26)
第二节 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基本政策原则 及风格	(39)
第二章 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	(48)
第一节 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48)
一 “一边倒”方针的缘起与战略考虑	(48)
二 毛泽东访苏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的签订	(53)
三 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	(57)
第二节 中苏论战与中苏分裂	(61)
一 中苏分歧扩大出现裂痕	(61)
二 中苏公开论战与国家关系恶化	(67)

2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

三 中苏分裂走向全面对抗	(72)
第三节 “三大障碍”的排除与中苏关系恢复正常	(79)
一 中苏关系的逐步改善与“三大障碍”的排除	(79)
二 戈尔巴乔夫访华与中苏关系正常化	(84)
第四节 苏联解体与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86)
一 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顺利过渡	(86)
二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88)
三 平等信任全面推进中俄友好合作	(92)
 第三章 中美关系	(99)
第一节 朝鲜战争与中美全面对峙关系的形成.....	(100)
一 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100)
二 朝鲜战局的转换与停战谈判.....	(106)
三 朝鲜战争的历史意义和外交影响.....	(110)
第二节 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及两国的严重对抗.....	(113)
一 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政策.....	(113)
二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	(116)
三 中美日内瓦会谈.....	(121)
四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	(124)
五 越南战争与中美对抗的加剧.....	(131)
第三节 中美建交及两国的合作与斗争.....	(136)
一 尼克松访华与中美《上海公报》	(136)
二 《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及影响	(140)
三 台湾问题的障碍与中美《八·一七公报》	(142)
四 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	(146)
第四节 冷战后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构.....	(150)
一 中美关系的恶化及逐步改善	(150)
二 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54)

第四章 中日关系	(164)
第一节 “渐进积累”式的中日“民间外交”	(165)
一 建国初期的对日政策与“民间外交”的启动.....	(165)
二 “民间往来、官方挂钩”方针的制定与中日 关系的改善.....	(171)
三 中日关系逆转与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可分 原则的提出.....	(175)
四 中日贸易三原则与半官半民关系的建立.....	(179)
五 中日复交三原则与复交运动的高涨.....	(182)
第二节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全面发展	(187)
一 田中角荣访华与中日复交.....	(187)
二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	(191)
三 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	(195)
四 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与走势.....	(199)
第三节 构建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日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	(206)
一 中日关系的一度停滞与恢复.....	(206)
二 中日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	(209)
三 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取得新成果.....	(214)
四 新时期中日关系的主要问题与前景展望.....	(215)
第五章 中国与欧洲及加、澳、新等国的关系	(220)
第一节 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220)
一 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建立及曲折变化.....	(220)
二 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调整与拓展.....	(227)
第二节 中国与西欧国家及欧盟的关系	(230)

4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

一	西欧的演变与中国对西欧的政策.....	(230)
二	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初步建立.....	(232)
三	中国与西欧国家建交的高潮及关系的稳定 发展.....	(236)
四	冷战后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调整及全面 发展.....	(240)
第三节 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		(243)
第六章 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248)
第一节	中国对第三世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	(248)
第二节	积极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252)
一	万隆亚非会议与“万隆精神”	(252)
二	解决与邻国边界问题的原则与实践.....	(255)
三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262)
四	中国与第三世界政治关系的新发展.....	(264)
第三节	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反霸的 正义事业.....	(268)

第七章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73)
第一节	50年代对外经贸关系的建立	(273)
一	打破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对华 “封锁禁运”	(273)
二	大力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经贸关系.....	(275)
三	中国对外援助的起步.....	(278)
第二节	60—70年代对外经贸关系的拓展与局限	(280)
一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开始走向多元化.....	(280)
二	积极拓展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	(282)
三	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	(285)

第三节 改革开放与对外经贸关系的新局面.....	(289)
一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	
基本形成	(289)
二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跨越式发展.....	(292)
三 努力实现对外经贸关系新飞跃.....	(297)
第八章 “一国两制”与中国统一大业的进程.....	(300)
第一节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及意义.....	(300)
一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300)
二 “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	(305)
三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06)
第二节 香港问题的由来与和平解决.....	(310)
一 香港问题的由来.....	(310)
二 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方针.....	(314)
三 中英谈判与《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	(317)
四 香港回归祖国	(321)
第三节 澳门问题的由来与和平解决.....	(323)
一 澳门问题的由来	(323)
二 中国政府解决澳门问题的策略与方针	(326)
三 中葡谈判与《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	(327)
四 澳门回归祖国	(331)
第四节 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334)
一 台湾问题的历史缘由与美国因素	(334)
二 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338)
三 台湾问题与中国外交	(343)
第九章 中国与联合国.....	(349)
第一节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及影响.....	(349)

6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

一	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由来	(349)
二	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的胜利	(355)
第二节	中国在联合国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工作	(358)
一	合力根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358)
二	促进“热点”问题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	(361)
三	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368)
四	中国关于裁军和军控的原则立场	(370)
第三节	中国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工作	(375)
一	努力促进世界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375)
二	坚持维护主权促进人权的正确原则	(378)
三	积极重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	(380)
第四节	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384)
结语		(388)
附录一	中外建交年表 (1949.10—1999.12)	(389)
附录二	参考书目	(399)
后记		(403)

序 章

新中国成立前中外关系的历史线索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曾经长期自立于世界先进行列，很早就与四邻邦国和地区建立了接触和联系。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特别是从秦汉以来，中国对外交往日渐扩大和频繁，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和特色的外交体制、外交理论和外交艺术，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明末清初以来，尽管也曾有过康乾盛世，但封建帝国的国力渐次衰微，并招致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和反动势力相结合，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的中国外交也由此进入近代时期，并陷入了屈辱的困境之中。腐朽反动的晚清政府和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投靠帝国主义，推行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借助于国际格局大变动的历史机遇，通过最激烈的方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基础，结束了自晚清开始的屈辱外交的时代，揭开了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新篇章。

第一节 中国古代外交的辉煌与局限

中国曾长期雄踞东方，自立于世界先进之林，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自立足于世界之林以来，就同四邻邦国和其他地区发生了接触和联系，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日渐扩大和频繁。在长期而丰富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建立了以“封”、“贡”为主要特征的宗藩关系体制和相应的外交机构，在外交理论、外交礼仪和外交艺术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其影响及于后世。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特殊性，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总的来讲尚不够充分，但仍创造了时代的辉煌。自从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中国的国号就已远播西方。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著名外交家张骞“凿空”，开辟连接中国及中亚、西亚乃至古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外关系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隋唐时期中外交往达到鼎盛阶段，特别是在盛唐，远近来聘者达 40 余国，唐朝的富强、自信和开放，使其威名远扬，直至地中海沿岸。宋元时期中外交往又形成新的高峰，特别是元朝时期沟通亚欧大陆，海陆通畅，与罗马教廷和许多欧洲国家建立直接联系，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大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来华并移居，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展示了中外关系的繁荣景象。明朝前期，著名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历时 28 年之久，到达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至非洲东部索马里一带，完成了我国航海史上的壮举，扩大和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掀起了中外交往的新一轮热潮。进入清代，至康乾盛世，除继续维护与亚洲周边诸国的宗藩关系，开展与英、法、美、西、葡、荷的沿海贸易往来以外，

在对俄关系上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有效地阻遏了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略步伐和野心。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和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南部属中国，北部归俄国，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并确定了两国商人开展合法自由贸易的原则。1727年7月，中俄签订《布连斯奇界约》，9月签订了《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次年又签订了关于两国政治、经济、宗教、边界诸关系的总条约——《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沙华纳依岭（即沙宾达巴哈）到额尔古纳河止，其间迤北一带属俄国，迤南一带归中国（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俄蒙边界）；确定恰克图为双方互市的地点，中国允许俄国每隔三年来北京免税贸易一次，人数不超过200人，俄国对华贸易取得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特殊地位。1792年中俄又签订了《恰克图市约》。此外，清政府还允许俄在北京俄罗斯学馆建造东正教堂，派驻传道团和官学生，由此培养了以罗索欣、列昂节夫、雅金甫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汉学家。以这些条约为基础，中俄边界保持了长期的安宁与稳定，中俄关系得到了改善与发展，中国的领土主权和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但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对外关系是以传统的宗藩体制为基础的。长期以来支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是一种天下意识和中国中心说。所谓“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皇帝是受命于天、君临万邦的“天子”，外国君主只有承认是中国的藩属，向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奉正朔，受册封，尊

^① 转引自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中国为“上国”，才能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是封建宗法分封制度在国家相互关系上的反映。毋庸讳言，这种宗藩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但我们也应该指出，这种隶属关系与西方列强和弱小国家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特别是在内容上有着实质的不同。西方近代外交是自17世纪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交往的频繁以及列强争霸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国际关系注重国家而非君主。外交所遵循的一整套制度、惯例、程序和形式等，也具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西方列强对待殖民地或殖民保护地（Colonial Protectorate）直接委派总督等官员和军队去统治，完全剥夺其内外权利，在国际法上不承认其为主体。^① 它们在国际争霸的过程中所建立的一些附庸国（Vassal State）、被保护国（Protected State）等等，虽然依据条约规定有些大小不一的内外权利，但其内政仍受控制，外交主权仍由或主要由其“宗主国”（Suzerain State）或保护国（Protectorate）代表行使，因而都不是完全的独立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最多只能承认其为不完全的主体。事实证明，在这种隶属关系下，殖民地、附庸国和被保护国及其人民所得到的，只是资本主义“文明”强盗最残酷的奴役和掠夺。虽然，“对于中国与其属国的关系，西方通常以 Vassalage（即附庸关系——引者）一词来表示。但是，尽管在翻译上竭尽努力，该词也仅仅是个接近词。”^② 这是因为，按近代国际法及其实践来看，中国并不具有西方国家“依据”条约对附属国行使的那种“宗主权”（Suzerainty），中国与周边国家藩属关系虽有上下尊卑之分，主要基于历史的传统，且是体现在名分上，并不否定其独立主

^① 关于上述法学概念及区别，可参阅〔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中译本第1卷（平时法）“国际人格者”等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外交学会1954年版。

^② Chere, L. M. The Diplomacy of the Sino-French War (1883—1885),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78, p. 10.

权。《清史稿·宾礼》中的一段材料有助于理解此点：

清初藩服有两类，分隶理藩院、主客司。隶院者，蒙古喀尔喀、西藏、青海、廓尔喀是也；隶司者，曰朝鲜，曰越南，曰南掌（今老挝），曰缅甸，曰苏禄（今菲律宾），曰荷兰，曰暹罗（今泰国），曰琉球。亲疏略判，于礼同为属也。西洋诸国，始亦属于藩部，逮咸、同以降，欧风亚雨，咄咄逼人，觐聘往来，缔结齐等，而于礼则又为敌。夫诗歌“有客”，传载“远邻”，无论属国、与国，要之，来者皆宾也。我为主人，凡所以将事，皆宾礼也。^①

越南等为属国，但不归理藩院，西方国家为独立主权国家，与越南等属国又同属礼部主客司，礼节无二。显然，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国家的独立主权并未因此而被否定，那么，越南等国亦无二致。究其原因：“盖中国之于属国，不问其国内之政，不问其境外之交，本与西洋各国之待属国迥然不同。”^② 中国历代相沿的传统政策，是不干涉属国的内政外交，只有在其遭受内忧外患，威胁受封者的王统地位和国家安全时，才会应其国王请求视机排难解纷，出兵救助，且属于义务性质，如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战争便属一突出例子，而不是像西方列强那样根据什么条约而来的干涉“权利”。在经济方面，允许在边疆互市通商，中国并没有在藩属国取得什么特殊的经济权益。藩属国按期进贡方物，中国皇帝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予以回赐。而且，通过朝贡而进行的贸易活动，也往往是藩属国多获利益。这种历史的传统政策和态度，被认为是符合于儒家“柔远”和“抚小”的王道精

^① 《清史稿》第91卷，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73页。

^② 《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08页。

神的。

中国与朝鲜、越南等近邻的“宗藩关系”，不像西方那样用条约来规定，而是建立在传统和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东方各国长期处于封建时代，落后的自然经济使彼此之间难以产生稳固的经济联系和市场，强弱不一，一国内部也经常出现政治分裂或割据战争，国与国之间也难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因此，弱小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就力图依靠强大国家的封建统治者的力量来巩固统治，安内御外。在这方面，中国在东方享有优越的地位，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和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先进发达，很自然成为近邻国家亲附的对象，从而形成这种东方式的国际关系。《清史稿》在评述清初越南等国相继入贡请封的原因时说：“盖其时武义璜璜，陆慑水栗，殊国绝域，交臂诎膝，慕义归化，非以力争。”^①当然，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持宗藩体制，与其“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自大虚荣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是，他们的着眼点却是重在睦邻友好，保卫边疆国防安全。“盖外藩者，屏翰之义也。如高丽、越南、缅甸等国与我毗连，相为唇齿，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外藩之必须极力扶持者。”^②显然，“绥藩固圉”是对双方安全关系的一个扼要的表述，中国方面则在其中负有主要的义务。在实践上，“宗藩关系”对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封建的“宗藩关系”及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而迅速变化的世界形势，从而限制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

自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渐次确立，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到 19 世纪 30 年代，

① 《清史稿》第 526 卷，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4575 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1 卷，故宫博物院 1932 年版，第 19 页。

世界资本主义经过长期缓慢发展后，已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而中国还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古老的封建国家。清朝封建统治者对于世界发展大势，依然沉湎于昔日的声威及四邻藩属拱卫朝贡的虚骄尊荣之中，同时为了保护封建经济，消除足以危害其统治权的外来因素，从乾隆起厉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中外贸易只限广州一口岸，并对中外人民交往及经济文化交流严格限制，带有明显的自我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但处在世界资本主义迅速上升的时期，清朝封建统治者要使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资本主义这种无限扩张的倾向必然要把中国拉入世界市场。在当时，英国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在当时世界的对外贸易中居于首位，因而由它充当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急先锋也就不是偶然。清朝封建统治者用消极闭关的办法，不但不能把外国侵略者长期阻挡在外，反而使自己丧失了深刻认识急剧变化的世界的机会，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从而在即将到来的严重冲突中陷入被动与失败的困境中，以屈辱的方式进入了近代。

第二节 晚清外交的屈辱与困境

从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历史上称为晚清时期。晚清外交是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开始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厄运，决定了晚清外交要蒙受巨大的屈辱。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7页。

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晚清外交也是中国近代外交的起始阶段。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即《南京条约》，翌年又签订了两个附约作为补充。英国攫取了包括割让香港、赔偿军费、五口通商及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在内的种种特权。1844年，美国与法国又相继迫使清政府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侵略权益进一步扩大。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纷纷援例享有这些权益。1856年到1860年，英法两国联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除赔偿英法军费、割让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外，还给予列强公使驻京、增开南北口岸、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内河航行、沿海贸易、掠卖华工出洋、鸦片贸易合法化及控制海关、扩大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等诸多权益。沙俄趁火打劫，用武力和欺诈手段强迫清政府订立《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加之1864年订立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并获得边疆通商的优惠权益。这批条约订立的结果，使清政府闭关政策完全失败，中国领土主权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不平等条约体系得以确立，中国半殖民地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在遭受外来打击的最初阶段，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应几乎完全是根据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来的，首要维护的是大清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其失败便不足为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一些洋务派人士的推动和主持下，开始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在对外交涉中也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办法，主张以“忠、信、笃、敬”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寄希望于通过遵守条约和按照国际公法行事来保护国家利益。1861年在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奕訢总领，执掌外交权力，下设南、